中国校服百年变迁史

近日,“深圳校服真香”冲上热搜,引发人们对校服的关注。从“去哪儿买”,到“什么颜色”,再到“穿起来舒不舒服”,今天的人们讨论校服时,已经有了越来越具体的问题。可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多年,会发现那时的中国学生,甚至还没有一套固定的“校服答案”。

19世纪末20世纪初,随着近代新式学堂的出现,一些学校开始统一提供衣服、帽子、鞋履。这种由学校统一安排学生服饰的做法,被视为中国学生统一着装较早的形态。不过这个时候的学生服装没有固定的模式,有的学校仍是传统服装,有的已经有了西式制服的影子。

1912年9月,教育部公布《学校制服规程令》,对男女学生制服作出具体规定:男学生制服形式与通用操服同。寒季服用颜色为黑色或蓝色,暑季服用颜色为白色或灰色;女学生以常服为制服。寒季服用颜色为黑色或蓝色,暑季服用颜色为白色或蓝色,且制服一校中不得用两色。自中等学校以上着黑裙,女学校可特制襟章颁给学生佩于襟前以为徽识;制服质料以本国制造品之坚固朴素者为主。

这已很接近今天人们理解的“校服”了:有统一要求,有颜色规定,也有能够识别学生身份的标志。不过,不同学校在具体样式上仍各有讲究。1916年,12岁的林徽因曾穿着北京培华女子中学的校服留下合影:深色上衣配过膝褶裙,领口和袖口还做了装饰。这张照片成为人们认识那个时代学生服饰的一张经典影像。


林徽因穿着北京培华女子中学校服的照片

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,校园里的衣服整体上更加丰富。男学生有立领学生装,女学生流行“文明新装”,短衣、裙装取代了更加繁复的旧式服饰。规定的细化也在继续:1929年,教育部颁布《学生制服规程》,学生制服的规定更加具体:女生的制服可以是长袍,也可以是短衫配裙,而且要求校内统一。1937年教育部再次公布《修正学生制服规程》,提倡“中学生以上女生须一律戴帽”。

长袍、学生装、裙装、改良旗袍、童子军服,各有各的样子。当时校服首先回答的是学生身份的问题,至于穿着它能不能跑、能不能跳,还没有成为最迫切的问题。

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学生服装仍然没有完全统一。白衬衫、红领巾,这是校园影像中反复出现的组合。60年代,白衬衫、深色裤子/裙子依然常见,除此以外,军用服装引领时尚,水兵们贴身穿的白蓝相间的条纹T恤“海魂衫”成为学生中的时髦款式,几乎成为男孩子们的校服。

到了七八十年代,学生服装设计进入公共视野。1979年2月,北京展览馆举办“大中小学生服装统一式样展览”,选出拟推广的大中小学学生服装统一式样。1983年3月,北京展览馆举办“全国学生服装设计展览”,获奖服装中包括上海的中长花呢女大学生春秋套装、辽宁的带活领结的女学生连衣裙、广东的女小学生尼龙背带裙等。过去更多是“学生穿什么”,现在开始变成“学生装应该设计成什么样”。

真正让今天的人对校服形成共同印象的,是90年代以后逐渐普及的运动式校服。

原因很简单:衣服得跟着学生一起动。体育活动越来越多,这对校服的舒适性和活动便利性提出了更直接的要求。同时,运动服价格相对较低,制作方便,面料耐穿,版型宽松,能够适应孩子迅速变化的身形。蓝、绿、红等颜色搭配白色条纹或色块,宽大的版型,再加上校名、校徽,逐渐成为许多学校的共同视觉。

2015年,国家标准《中小学生校服》GB/T31888-2015正式发布并实施。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校服产品的综合性国家标准,对校服的基本安全和质量提出统一要求。


现在的运动装校服

回头看中国百年校服,真正值得追问的,也许并不是“哪一个年代的校服最好看”,而是“哪一种校服,更适合那个时代的学生”。早些时候,人们首先关心的是“有没有一套统一的学生装”,后来开始关心“款式怎么样”,再往后是“穿着舒服不舒服”“质量合不合格”……2026年深圳校服的讨论,恰好又把这些问题推到了日常生活里。 来源: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闲话

『溜须』是谁溜谁的须

□ 陈思炳

一次,宋代名相寇准的胡须沾上了汤饭,副相丁谓忙上前将他的胡须仔细整理干净。这就是广为人知的“溜须”。寇准笑说:“你是国家大臣,怎么能替长官擦胡须?”丁谓又羞又恼,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。

但在寇准看来,丁谓是个有才能的人。寇准早年曾不止一次向宰相李沆推荐丁谓,但李沆始终不用。寇准问李沆这是为何,李沆笑说:“将来你后悔的时候,就会想起我。”寇准第一次被罢相,继任宰相王旦评价丁谓说:“丁谓以后如果独自当权,必定害国害己。”寇准不信。

十几年后,寇准最后一次担任宰相不久,就把丁谓调为自己的副手。从那以后,丁谓一路官运亨通,并取代了寇准。没过多久,寇准就被丁谓的谗言陷害了,一贬再贬,最后卒于贬所。丁谓还将朝中与寇准相善的大臣全部清除,手段非常狠辣。

轶事

鲁迅喜欢包书皮

□ 颜士州

鲁迅是一个非常爱护书籍的人,只要是他常看的书,不管工作怎样繁忙,总要抽出时间先把书包起来。从他手里借过书的人都知道,鲁迅所赠之书均是包好书皮的,不是用报纸就是用别的包书纸把书包得整整齐齐、有棱有角的。因为在他看来,书是知识的海洋,是最值得珍惜的朋友。包书皮虽是一件小小的事,却体现着一个人对知识的敬重。

鲁迅所用的包书纸,并不都是好纸,常常是人家寄书刊给他用过的纸。平时他在接到书刊时,倘若发现封面是容易破损的,他便找来糨糊和厚厚的纸,将厚纸剪成小长条沿着封面反面的边沿贴好,然后慢慢地把书打开,一页一页地把书的卷角折过来恢复原样,再搬来一摞书把翻卷的书角压平,过几天,当书平平整整后,包好书皮藏好。由于鲁迅十分细心,又有一手包书皮的技术,所以虽是人家已经用过的包书纸,一经他手,又都整旧如新。

鲁迅的包书技术是他注意学习的结果。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,但并不像旧时代的读书人那样鄙薄劳动人民,反而很乐意跟他们交朋友,学习他们的一技之长。周启明回忆道:“少年时代的鲁迅喜欢买新书。因为去的回数多了,对于书坊伙计那么叮咛妥帖的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看熟了,便学得了他们的方法,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,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。”

释义

“日上三竿”是几点

□ 佳遇秋阳

小孩子周末睡懒觉,常被父母呵斥“都日上三竿了还不起”,可见“日上三竿”是形容时间已经不早了。那“日上三竿”说的又是几点呢?

西周时期,人们就掌握了“立竿测影”的方法。所谓“立竿测影”,就是在地面上竖一根均匀笔直的木杆,每当清晨太阳升起后,竿影便会随着太阳高度的变化逐渐缩短,正午时分影子最短,午后又会慢慢变长。

以中原地区为例,春分、秋分时节,“三竿”之时约在早晨7点30分至8点。而到了冬至,太阳斜射,“三竿”可能延迟至8点30分左右。

虽然这个时间放到现在也不算太晚,可古代的老百姓多在卯时(5点到7点)左右起床劳作,辰时(7点到9点)人们都开始干上午的农活了,若“日上三竿”才起床,确实已错过早间劳作的时间。